

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李红霞 马 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 100070)

内容提要: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政府预算始终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及保障性作用,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2021年4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了继续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要求和具体措施。推进改革的大框架已经确立,多项财税改革措施也将加快推进。站在“十四五”开局的关键节点上,把握国家重要战略机遇期,进一步深化预算制度改革,有助于顺应经济发展新格局、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预算制度改革 紧平衡 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544(2021)10-0052-07

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着力点、突破口,由于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存在,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财政还将持续处于“紧平衡”状态。尤其随着全面深化改革步入“深水区”,预算管理制度中一些深层次问题已逐渐显现,如预算资金统筹力度不足、预算约束软化、部分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等,影响了财政的可持续性发展。那么,现阶段预算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戏”,应如何找准切入点精准发力,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成为值得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2021年4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21〕5

号)正式颁布(以下简称《意见》)。本文基于《意见》中提到的几个关键问题,加以分析探讨,以期改革提供参考。

一、规范政府收入管理,重点整治过头税费

《意见》首先提出要规范政府收入预算管理,要实事求是地编制政府收入预算,严禁收取过头税费,依照法律法规及时足额征收应征的预算收入等。规范政府预算收入管理,是进一步深化预算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通过增强对预算收入的规范管理,加大政府收入的统筹力度,以做好重大决策部署的财力保障。

〔收稿日期〕2021-06-15

〔作者简介〕李红霞,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财税理论与政策研究、政府预算理论与实务等;马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财税理论与政策研究等。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减税降费政策效果绩效评估与风险防范研究”(20BJY21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新时代中期预算脆弱度分析与可持续路径选择研究”(18YJA790044)、北京市教委社科重点项目“北京市中期预算引入预算绩效改革问题研究”(SZ202010038021)。

(一)“过头税费”屡禁不止

税费是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合理征收税费是促进国家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条件。《意见》明确要求,“严禁收取过头税费、违规设置收费项目或提高收费标准。依照法律法规及时足额征收应征的预算收入,如实反映财政收入情况,提高收入质量,严禁虚收空转。”过头税费问题由来已久,近年来,随着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尤其受新冠疫情影响,各地税费收入普遍下滑,财政支出压力明显加大,一些地方政府财政困难日趋严重。为了弥补收支缺口,一些地区出现了税务部门将来年甚至是以后更多年份的税款提前收上来,或采取提高税率、随意设置罚款、集中清欠、转引税款等方式向社会过度征收税费^①。征收“过头税费”不仅虚增了财政收入,掩盖了财政收入的真实性,同时也给企业带来沉重的负担。虽然近年来中央出台文件,要求各地开展对“过头税”的自查工作,但有些地方收“过头税费”现象仍然屡禁不止。

2020年6月28日,国务院督查室公布了一个反面案例。河北衡水景县政府及税务机构存在搞税收排名,清缴补缴欠税,向企业分解税收任务、征收“过头税”等违规问题^②。也有一些部门利用政府指定其承担防控任务,通过巧立名目随意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取费用范围等违规收取多项费用。一些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征收税费也存在监管制度滞后、监管缺位、监管乏力等问题,导致出现违规揽收收费以及以清缴补缴税费的名义,增加市场主体的不合理负担。

(二)“过头税费”加剧财政风险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主要以GDP和财政收入等指标作为政绩考核的主要依据,作为税务部门来说则以当期完成税收任务的多少进行考核评估。当经济过冷时,税务部门为完成收入任务会有意识多收税,容易出现征收“过头税”现象,令企业苦不堪言,

甚至出现一些企业从银行借钱交税款的情况,这无形中加重了市场主体的税收负担。而当经济过热时,又会出现“压库”现象,该上缴的税收不上解国库,或有意识放松征管将应征的税收少收或不征,不能做到应收尽收,使经济“热上加热”,就出现了预算执行的“顺周期”问题。这不仅不利于依法征税,也会影响政府“逆周期”宏观调控的效果。另外,当地方政府收不抵支问题日益突出时,为了确保当年税收任务的完成,还会采取“财政空转”等违规方式虚增财政收入,将已经通过程序入库的税收收入,再通过财政部门以财政补贴形式返还给企业,然后企业再将收到的财政补贴再次入库形成“账上”财政收入,如此反复循环,导致虚假财政收入规模增大。而在财政收入虚收的同时财政支出往往是呈刚性增长的,则虚收实支的结果最终会加大财政缺口。因此,收取“过头税费”的做法,不仅严重违反了《预算法》将收入及时足额上缴国库的规定,影响了税收的严肃性,还给预算收入的编制、执行及决算都带来了严重困扰,加剧了财政收支矛盾和财政运行风险,而且容易导致对经济形势的误判,甚至扭曲经济的正常运行。

(三)多措并举治理“过头税费”

目前,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不再以GDP大小和财政收入多少作为重要考核依据^③,这有利于从根源上减少地方政府收取“过头税费”的冲动,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逆周期”调控的作用,以有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2020年4月和6月,针对各地收取“过头税费”现象,国家税务总局连续发布两项通知,分别是《进一步落实落细税费优惠政策坚决防止违规征税收费的通知》(税总发〔2020〕24号)以及《优化税务执法方式严禁征收“过头税费”的通知》(税总发〔2020〕29号),并提出明确要求,坚决防止违规征税收费,杜绝一些地方税务部门在年底收入任务“吃紧”的情况下,突击收税、“寅吃卯粮”现象。根治“过头税费”,要坚持依法征税,加强税收征管,坚决杜绝“过头税费”,禁止乱收费、乱设罚款,不搞集中追缴清欠、坚决禁止采取“空转”、转引税款等手段虚增收

①谢伟.“过头税”再抬头地方增收花样多[N].21世纪经济报道,2012-09-04.

②国务院督察室:河北衡水县摊派捐款 举债搞迎检[N].人民日报,2020-06-28.

③钟祺.中组部发新规透露干部考核新变化[N].长江日报,2020-11-12.

入。要做到应收尽收,进一步建立健全税费收入质量监控机制,利用大数据完善税费收入实时监控体系,对税费畸高畸低等异常情况,及时进行分析排查,发现收取“过头税费”违法违规行为一律严肃处理。同时,在实践中,如果出现不落实国家税收优惠政策情况,也等同于收“过头税”,不折不扣地把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到位,把该减的税减到位、该降的费用降到位。严禁在税法及相关法规授予的管理权限之外,出现擅自对国家税收政策进行更改、调整甚至变通执行的行为,不能采取越权减免或采取“先征后返”等方式变相进行减免税。要加强对非税收入的管理,切实做到依法依规征收,防止采取不正当手段虚增非税收入,进一步提高财政收入质量,夯实财政收入基础。从长远看,还要加快构建数字智能化税务管理体系,强化数字化税收的征管,增加现代税收制度与数字化转型的匹配度,以适应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规范政府支出管理,着力优化支出结构

《意见》在规范政府预算支出方面提出,要合理安排预算的支出规模,进一步加强对国家重大政策支出的财力保障,打破财政支出结构固化和僵化格局,不折不扣落实政府过紧日子理念,充分发挥财政政策逆经济周期调节作用。

(一)发挥政府支出“四两拨千斤”撬动效应

政府支出一直是宏观经济学中经久不衰的研究话题,它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对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提升我国可持续发展能力,政府支出起着关键性作用。提高政府支出有效性离不开探讨消费与投资的关系,消费与投资作为刺激需求的两种基本形式,对拉动经济都很重要。但在不同经济周期及经济发展阶段,二者的重要性又有所不同。古典经济学家萨伊认为:“投资与消费相比,投资的效果更高一筹,鼓励投资是高明的政策,而鼓励消费是拙劣的政策。”^①虽然萨伊的这种说法有些偏颇,但也有其

深刻的道理,一般认为投资需求增长受到消费需求增长的制约,投资需求的增长最终通过消费需求的增长来实现,但根据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应该是以政府有效投资形成有效供给来带动消费需求的实现,使消费得到长期、可持续性满足。^②如果只讲消费避而不谈投资的有效供给,那么这样的消费就是没有质量的消费,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为此,应进一步发挥政府支出的杠杆作用,通过形成有效投资带动消费,产生“四两拨千斤”的撬动效应。

(二)重中之重是优化政府支出结构

众所周知,罗斯福新政是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对经济进行干预,缓解了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危机,通过投资公共工程以刺激经济快速增长,恢复经济增长活力。但从实施结果看,虽然短期内带来了经济繁荣,增加了就业率,但伴随着的是高通货膨胀和政府的“债台高筑”,也增加了财政风险。扩大政府支出带给美国经济恢复只是一种表象,并没有真正创造出新的、可持续的经济内生增长动力。这意味着政府支出对市场经济的过度干预会让市场成为一个“巨婴”,会使市场缺乏应有的活力和效率。因此,如何通过政府有效支出调结构、补短板,在调控经济过程中真正做到激发市场活力,刺激经济主体的创造力是当务之急。

目前,关注政府支出已不是简单地扩大支出规模的问题,而是如何使政府支出结构更加合理优化,以及政府支出效果更加显著和支出质量如何得到提升的问题,这是当前我国政府支出领域急需解决的真问题。近几年,政府支出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疫情缓解后,各地为刺激需求盲目找项目、上投资,导致一些地区行业出现产能过剩,支出效益低下。与此同时,居民收入虽然呈现增长的总体趋势,但消费需求却在往下走,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这就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短期内通过政府扩大支出规模拉动经济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现阶段老百姓的一般衣食住行等消费都已基本满足了,人们在追求更高质量、高水平、高层次,甚至更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如果还像以往那样

^①贾康结合财政政策贯彻稳投资[OB/OL].贾康学术平台,2020-08-03.

^②贾康.新供给经济学[M].山西经济出版社,2015年8月.

“大水漫灌”式的支出刺激最终只能事与愿违,徒增政府支出压力,要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是“可望而不可及”。这就需要政府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通过政府有效支出提供有效供给,让消费者不仅有钱可花,也有花钱的需求与动力,形成投资与消费的良性循环。

(三)政府和市场协同促进支出高效

《意见》提出,要“加强预算管理各项制度的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传统的公共产品理论强调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即政府和市场各有各的职责,不能“越俎代庖”,而现代财政理论注重从“划清政府和市场边界”转向“政府、市场及社会的合作”。其实,政府和市场关系不是对立的干预与被干预、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政府也不应以“干预者”、“纠错者”的身份出现,政府和市场是一种分工与合作的关系,不能简单地替代或此消彼长,就像人的左手和右手,二者各有各的功能,不能互相替代。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政府只有与市场、社会协同形成合力,政府支出才能落到实处且更加高效。因此,提高政府支出效率,要通过优化支出结构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支出引导及乘数效应,突破以往划清政府和市场的界域思维,实现不同主体行为的协同合作,充分发挥政府支出“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

三、健全地方举债机制,防控化解债务风险

《意见》明确要求,要健全地方债限额的确定机制,进一步防控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要将一般债务限额和专项债务限额分别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等相匹配,尤其要把防控和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当作重要的政治纪律及

政治规矩。

(一)地方债“逆周期”调控

地方债作为“逆周期”财政政策的发力重点,已成为拉动 GDP 增长的重要力量,2015 年-2020 年,我国地方债累计发行额为 29.2 万亿元^①。2020 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288074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42889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145185 亿元^②。尤其 2020 年以来面对新冠疫情冲击,地方专项债作为“三箭齐发”组合政策之一,成为“补短板、稳投资”的直接力量,对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15 年-2020 年,我国地方专项债券发行额从 2015 年的 0.1 万亿元增长到 2020 年 3.75 万亿元^③,发行规模越来越大。

当然,肯定地方债在宏观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随着近几年地方债的提速扩容,地方债的风险防范也愈加重要。地方债存在“空转”、收益测算虚高、披露不全、监管乏力等问题,导致地方债风险隐患频现。为了防范地方政府举债风险,财政部制定了《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并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该办法明确规定,地方债一般债券主要用于没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专项债券与一般债券不同,主要用于可以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但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专项债主要以政府性基金收入等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财政部特别要求,地方财政部门应强化专项债项目的全过程管理,尤其对专项债项目的借、用、管、还各环节实行逐项监控,确保债务到期偿债、严防偿付风险。

(二)地方债风险不容小觑

现阶段,从我国发行地方债整体规模来看,地方债显性债务规模是可控的,但是隐性债务风险却不容小觑。衡量地方债务风险一般可以用两个指标表示,分别是债务率和负债率。第一,地方债务率:用期末债务余额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之比来表示,这个指标可以反映地方政府手中掌握的综合财力

①刘颖.2015 年以来地方债整体发行情况及政策建议[J].债券杂志,2021-02-10.

②2020 年 12 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情况[DB/OL].财政部网站,2021-01-26.

③孙凤凤.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现状分析[DB/OL].财政部网站,2020-07-06.

对尚未偿还债务的承受能力,债务率警戒标准一般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建议的参考值“90%—150%”。2019年,我国地方债务率约为82.9%左右^①,可以看出,地方债务率低于国际警戒线。第二,地方负债率:用期末债务余额与GDP的占比来表示,这一指标的国际通行警戒线是60%。截至2019年底,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21.3万亿元,若加上当年中央债务余额16.8万亿元,可以计算出全国政府负债率仅为38.5%^②,远低于60%国际衡量债务风险的预警线。这说明如果单独评价显性地方债务风险处于可控状态。与显性地方债务相比,地方隐性债则信息透明度较低,究竟有多大规模?以什么方式存在都众说纷纭。近几年,一些高校、智库等研究机构、都测算过地方隐性债规模,测算结果之间差异较大,但大多都在25万亿—45万亿区间内。可见,我国地方隐性债务潜在风险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三)破除“兜底幻觉”,主动化解地方债风险

尽管我国地方债风险总体可控,但其实到目前为止,地方债总额以及地方政府真实的收入和资产状况并不清晰,再加上疫情影响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地方政府未来的偿债能力会有所下降,加大地方债风险化解难度。破解这一难题,首先应打破中央财政对地方债的“兜底幻觉”,这样可以增强地方政府按期还债、化解地方债风险的主动性。近年来,中央政府按照开正门、堵后门的思路,加大力度规范和强化地方债管理,在允许地方政府适度举债前提下,对地方举债主体、举债方式、举债规模、举债用途及风险控制等做出了明确要求,并实施了债务置换和限额管理,建立地方债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及责任追究制度,提高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能力。2016年,我国发布了《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首次明确提出“中央实行不救助原则”,

2021年,财政部又在公布《2020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时强调,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建立起市场化、法治化的地方债违约处置机制,要做到“谁家的孩子谁抱走”。坚决遏制住地方隐性债务增量,严禁违规让地方政府变相举债,禁止新增隐性地方债上新项目铺新摊子。因此,要从财政运行安全和财政可持续发展出发,进一步健全地方债监督问责机制,坚决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坚持地方债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始终保持高压监管态势,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与此同时,还要加快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减少地方支出压力,从问题产生的源头着手化解风险。

四、强化预算绩效管理,管好政府的“钱袋子”

《意见》指出,要进一步增强预算绩效管理,不断增强预算的约束力,全面树立绩效理念,推进预算绩效提质增效。加强重点领域预算绩效全过程管理,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在实践中的应用,尤其对那些低效或无效的资金做到削减或全部取消,对长期沉淀的资金一律按规定收回,并与其他财政资金统筹安排。

(一)预算绩效是政府履职的“试金石”

增强预算绩效管理,是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提出要针对预算资金进行“三全”,即全过程、全方位、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2020年,财政部颁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意见的精神。预算绩效是检验政府履职的“试金石”,是提升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关键举措,也是建设负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有力工具。随着国家的“钱袋子”越来越沉,如何确保纳税人的钱都能花出实效,如何将绩效理念深度融入政府治理的全过程,完成从政府管

^①许宏才.2019年底地方政府债务率约为82.9%[DB/OL].澎湃新闻,2020-04-03.

^②潘子璇.财政部:截至2019年底我国政府债务率为38.5% 债务风险总体可控[N].新民晚报,2020-04-03.

“钱袋子”回归到管好政府“钱袋子”的重大转变,就成为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预算绩效问题凸显

预算绩效作为透视财政资金活动的“多棱镜”,可以全方位、多角度监督财政运行状况。近年来,预算绩效在透视财政运行中仍有诸多不足之处。其中,较为突出的是预算绩效管理主要以财政部门单兵推进为主导,还未能与其他主体形成高效联动。同时,还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三全”预算绩效理念尚未牢固树立。还没有将绩效理念及科学方法融入到预算编制、审查、执行及监督全过程,预算执行中的全方位、全覆盖、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还未真正建立起来。二是预算绩效尚未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绩效监督还没有覆盖到所有财政性资金及“四本”预算,部分地区财政资金使用低效率或无效率,存在资金挪用或闲置浪费等现象,一些专项资金存在“暗箱操作”、截留私分及虚报冒领等。三是绩效评价结果“奖罚”政策体现不够明显。绩效考核结果与未来年份预算安排没有完全挂钩。还没有构建完整的共性绩效指标和分地区、分行业、分领域的个性化绩效指标体系。

(三)进一步强化预算绩效管理

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应在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一步做到多主体共同参与并协同推进,充分调动各级党委、人民代表大会、财税部门、审计机构、部门预算单位等多方力量,建立相互协作、相互监督的协同机制。首先,应坚持党对预算绩效管理中的引领作用,在把握政治方向、制定方针政策及促进改革方面进行指导。其次,财政部门要做好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组织协调工作,提高预算绩效管理的规范化及科学化水平,强化各部门预算单位使用财政资金及执行预算绩效的主体责任,督促其真正承担起第一责任人职责。再次,各级政府要加强对本地区预算绩效管理的组织领导工作,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个性化的预算绩效实施办法,监督并指导本地有关预算绩效政策措施的落地落实。预算绩效管

理多主体之间应明确各自相关责任主体的权责,彼此之间要形成良性互动,进一步完善各地区、各行业等各类绩效评价体系。各级政府要将预算绩效的评价结果纳入行政绩效和干部绩效考核体系,充分调动各地区各部门领导履职尽责的积极性。预算绩效改革应与政治治理同步进行,要打造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切实提高多主体之间的契合性与制约性。

在做好协同推进的基础上,还要着力推进以下几方面改革。一要更加注重硬化预算约束,实现预算加绩效的全流程、一体化管理,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资源配置效率,从制度上改变财政支出结构固化的利益分配格局,提高预算资金管理水平。二要将各级政府的收支预算全面纳入绩效管理,确保预算绩效管理不仅“横向到边”还要“纵向到底”,一直延伸至基层资金使用单位的终端。三要建立“无缝隙”预算绩效管理链条,还要加强“四本”预算之间的钩稽关系衔接及资金绩效管理,进一步明确预算执行过程中的绩效问责,增强预算绩效管理激励约束机制。四要构建大数据治理与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平台,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进一步提高绩效管理的科学化水平,管好政府的“钱袋子”,有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五、提高预算透明度,切实强化对政府的有效监督

《意见》明确指出,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推动预算目标及绩效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改进预算、决算公开机制,大力推进各级政府预算决算及财政政策的公开,增强财政透明度。

(一)预算透明任重道远

提高预算透明度,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强化政府受托责任,建设廉洁、高效政府,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重大基础性制度安排。近年来,针对政府收支信息透明度不高情况,中央政府持续加强对政府收支信息披露的管理,按照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0 年政务公开工作的通知》要求,坚持“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力争打造“阳光政府”。2020 年,共有 102 个中央部门(单位)向社会公开 2020 年的部门预算,比 2019 年预算公开范围进一步扩大;有 97 个中央部门公开了 109 个项目绩效目标表,是 2019 年的 2 倍多^①。

2021 年,中央提出继续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透明,有利于优化支出结构,把钱用在“刀刃上”,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但是在现实中,“透明预算”之路并非一路畅通。根据 2019 年《中国市级政府预算透明度报告》,在 295 个地级市及地级以上城市之中,按百分制得分在 60 分及以上的共有 118 个城市;得分在 50-59 的有 55 个城市;得分在 40-49 之间的有 56 个城市^②。在百分制 60 分及格的情况下,透明度的平均分并没有达到及格线,说明我国财政透明度水平总体不高,预算透明仍然任重道远。

(二)以预算公开促预算透明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打造阳光政府必须做到预算透明。要通过打造“透明预算”,把政府收支活动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各项财政收支置于透明的“鱼缸”中,以便接受社会监督,督促政府加强预算管理,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益。多年以来,财政收支在公开时,存在着“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现象,政府收支活动不够公开透明。近年来,随着预算制度改革的深入,无论是从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还是预算内容的全面性来看,各级政府在预算透明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纵观世界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在推进预算改革进程中,都是在加强预算监督,推进预算透明中获得成功的。预算不公开的政府是“看不见的政府”,而“看不见的政府”不可能是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我们强调预算透明的初衷,就是让“看不见”的政府变成人民“看得见”的政府。

①曾金华.102 个中央部门集中向社会公开 2021 年预算. 经济日报, 2021-03-26.

②清华大学课题组.2019 年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经济网, 2019-08-16.

(三)推进“透明预算”的路径

首先,应尽快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法》,发挥社会公众监督政府权力运行的重要作用。其次,应构建信息公示制度。除了政府信息要及时向社会公开,还要进一步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内容及绩效目标,要将预算执行情况等依法依规向社会公开。不断细化部门预算、决算公开的范围及内容,各部門单位预决算报表等都应依法向社会公开。各级财政部门要将重要的绩效评价结果与预决算情况一同报送到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并主动向社会公开,搭建起参与式预算管理平台,自觉接受人大、审计机构及社会各界的监督。再次,实施参与式预算。在预算编制、审查、执行及绩效评价等环节,为社会公众及社会组织等参与预算创造条件,让社会公众监督机制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最后,要加强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财政之间的信息贯通。运用先进信息科技手段去支撑各级政府的预算管理平台,并规范各级政府预算执行监督流程,进一步统一财政数据的公开标准,推动大数据资源共享,健全完善预算公开的配套措施和技术条件。

参考文献:

- [1] 专家解读《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N].中国财经报,2021-04-15
- [2] 郭庆旺.减税降费的潜在财政影响与风险防范[J].管理世界,2019(6).
- [3] 高培勇.积极财政政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经济日报,2020-01-12.
- [4] 王雍君.预算改革应作为财政改革切入点[N].金融时报,2019(4).
- [5] 李红霞,周全林.中期预算框架下预算绩效改革:逻辑起点与路径选择[J].当代财经,2019(1).
- [6] 刘尚希.应对疫情冲击,宏观政策如何发力[J].中国经济网,2020-04-01.
- [7] 段相宇.政府过紧日子百姓过好日子[N].中国纪检监察报 2021-06-12.
- [8] 马蔡琛.论预算绩效指标框架的构建[J].云南社会科学,2019(1).

【责任编辑 寇明风】